

要求在於，既要讓各類工具各司其職、發揮特長，又要將其打通使用，避免局限於在某一領域，以及囿於單一政策工具。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對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目標，即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準做出了新

的詮釋。這一目標包含兩個要點：一是在2020年基礎上實現人均實際GDP翻一番；二是到2035年人均GDP需超過2萬美元這個發達國家門檻水準。這兩個條件同時滿足，即達到了我們的最低目標。當然，我們還可以爭取更好的結果。

二、促就業：“新形態化”“內卷化”“年齡兩端化”

在三位一體的“統籌”中，為什麼首先強調“促就業”？這是由當前就業形勢的特點決定的。目前，我國就業領域正在發生顯著變化。

許多專家都提到了宏觀經濟數據的“溫差”問題，即統計數據與微觀主體的實際感受存在不一致。從經濟學原理來看，一個最大的變化是傳統的“菲利普斯曲線”似乎消失了。我們在學習宏觀經濟學時，被曼昆稱為“經濟學十大原理”之一“菲利普斯曲線”，就是指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存在負相關的權衡取捨關係(Trade-off)。然而，現在的統計數據表明，這種傳統的負相關關係已經很難觀察到了。例如，利用國家統計局資料庫中的“城鎮調查失業率”與“核心CPI”畫關係圖，根本看不到預期的權衡取捨關係。

與此同時，另一條曲線——“貝弗裏奇曲線”的重要性反而凸顯出來。貝弗裏奇曲線描述的是勞動力市場中崗位空缺率與失業率之間的關係。在正常情況下，兩者應呈負相關：崗位空缺多，失業率自然低；反之亦然。但當前我們觀察到的現象是貝弗裏奇曲線正在向右上方移動。這意味著，崗位空缺率在提高，同時失業率(特別是自然失業率)也在提高。這種“雙高”現象揭示了勞動力市場面臨的結構性矛盾，通俗地說就是“有活沒人幹”與“有人沒活幹”並存。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在現實中看到通貨膨脹率偏低，同時企業投資信心不足、投資意願和消費需求均不振等現象。

這種結構性就業矛盾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就業增量的“新形態化”。當前，新增就

業中越來越大的比重表現為新就業形態，如零工經濟、平台就業等靈活就業。儘管不同口徑的統計數據略有差異，但總體趨勢是其占比持續攀升。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個體就業、私營經濟雇員以及不屬於任何單位的就業，這三類形態加起來，構成了最接近於“非正規就業”的群體。這部分人群往往缺乏正規的勞動合同，社會保障覆蓋率較低，勞動權益保障相對薄弱。已有數據顯示，這類就業占全部城鎮就業的比重已經超過60%，且仍有進一步提高的趨勢。

這種狀況是自動化和產業結構變化的結果，人工智慧技術的應用將進一步推波助瀾。AI對傳統崗位的替代將日益明顯，而被替代的勞動力往往會流向門檻較低的靈活就業市場；同時，AI創造的新崗位也呈現出靈活化特徵。就業形態的靈活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們無法改變。唯一能做且應該做的，是不能讓“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與“非正規就業”劃等號。因此，我們在社會保障制度設計、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以及勞動執法等各個方面，必須做出更大的努力。

第二，勞動力流動的“內卷化”。我在這裏使用的“內卷化”一詞，是指經濟學和社會學意義上的嚴格定義。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會在產業間以及城鄉間、區域間流動，其動力源於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品質。宏觀上，這便表現為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如農業)向高生產率部門(如非農產業)轉移，從低生產率地區向高生產率地區轉移。這種“劉易斯式”過程或“庫茲